
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纽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牛大勇

抗日战争是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当年，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经千难万险，付出惨重牺牲，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民族的独立。弹指间，五十周年过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海外华人作家笔会等三家北美华裔学人团体，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在一些基金会、华人企业、爱国侨胞的慷慨赞助下，于8月18—19日在纽约举办了“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学者近60人聚会于哥伦比亚大学，切磋讨论，若干因故未到会的学者也提交了论文。与会听众达一百多人，其中有从世界其他地区专程赶来听会者，足见抗战历史是海内外同胞共同关心的大事，也是连结世界各地华人的纽带。

8月的纽约，久旱无雨，骄阳似火。而会中研讨气氛更为热烈。某事某人、某个观点，往往会引起多人置评，反复辩驳，直至休会，言犹未尽。由于会议分两个会场同时进行，有关报告搜集又不充分，笔者只能就所见所闻有价值者，向读者略作汇报，不敢以偏概全，姑且称为“侧记”。

一 战时政治

复旦大学杨立强教授以《徐永昌日记》为据，探究抗战初期中国统帅部决策的幕后，认为这时蒋介石等人代表着主战的一方，徐永昌等人代表着主和的一方。直到1938年11月，蒋才与徐“偶及

妥协如何之”。中国最高统帅机关的用兵方策也值得检讨，可归纳为：中枢指挥紊乱，主帅当断不断，将官内外不一，队伍成份太杂，帷幄用兵不当等等。

与此对应，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认为，蒋介石有意隐瞒了自己1937年至1945年间同日本谋和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德国斡旋，在香港密谈，经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同日本联系，酝酿蒋、日（坂垣）、汪三方首要会谈等。和谈未成，并非蒋缺乏诚意，而是因日方态度傲慢、反复无常，汪伪方面阻挠，中共方面日渐增强的干预等因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先生则具体解剖了孔祥熙在抗战期间进行的中日秘密交涉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显然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事还曾向蒋汇报。蒋因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故采取了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其策略目的，一在“藉机探讨日本真相”，二在分化日本国内政治势力，三在破坏日伪间关系等。

有评论者指出，不能简单地以战与和评判是非。在实力悬殊，强敌挑起战端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谋国者一面应战，一面试探言和的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就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的后果而观之，战与和孰能把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可以考虑权衡的问题，列宁力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即为一例。应澄清的问题在于，蒋等人谋和，是有原则（即不丧失国家长远根本利益）还是无原则的？其退让是有限度还是无限度的？限度为何？一般论者以为，七七事变后，蒋之谋和限度，在以长城为线。日本对此，绝不能接受，蒋受各种因素牵制，也绝不能再让，故谋和绝无可能，只在策略运用。有人争论，蒋其实也不肯放弃恢复东北之权利。也有大陆学者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战时谋和，就是错误，至少影响了人心士气。还有人主张应进一步研究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其意在局部还是全局妥协等。

同这一争论有关的，是台湾学者李云汉先生的论文“国民政府

战前对日政策之演变”。他征引史料后提出“张学良实为‘不抵抗’的决定者，蒋中正以军事最高统帅地位而对东北之沦亡束手无策，自亦难辞其咎”。但是，“以当时中国政情与国力而言，抵抗的结果不仅不能保证是‘胜利’，甚至会酿成更悲惨的后果”。他认为，蒋介石此后定下了“长期抵抗”的方策，厘清了和战的“最后关头”；而“西安事变仅是促成抗战提早爆发的一项因素，但非决定性的因素”。理由之一是事变和平解决，只是使他改变了对中共的立场：由“剿共”改为“编共”。由于李先生本人因故未能到会，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没有机会在会上发表并展开讨论。

台湾文化大学的楚菘秋教授认为，应从整体与长远处，以宏观、冷静、求真、公平、负责的态度来研究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蒋对中国的最大功绩，莫过于领导积弱的中国，经过艰苦抗战而赢得最后胜利，取消列强加于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五强之列。应肯定蒋“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者”。最近有拥护“台独”的学者，竟指开罗宣言声明将台湾于战后归还中国，乃是为今日台湾订下了“卖身契”！这种荒唐逻辑，足令国人深长思之。

杭州大学杨树标教授专题论述了宋美龄 1943 年赴美求援之行，对宋此行之贡献予以积极评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奎松先生在论文中指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较融洽、较合作。双方搁置前嫌，相互信任，共赴国难。后来因种种原因关系恶化，其中深藏历史教训。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先生以“论皖南事变之善后”为题，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国民党也是坚决抗战的，但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酿成了削弱、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计划。他追述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对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和善后交涉之艰难，指出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两党彻底失去相互信任。国民党在善后过程中再次失去合作契机，中共从此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放手发展，终于导致战后的主客势异。

在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大陆学者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及

其代表人物所持的较开放的历史主义态度,引起海外学者的积极反应,感到了有平等和平心论争的基础。有学者认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虽较融洽,但始终谈不上建立了“相互信任”,前嫌只是“搁置”而未“捐弃”,所以才会有后来那些变化。杨树标、汪荣祖两位先生就蒋宋功过,李(敖)、秦(孝仪)学品,针锋相对,反复辩难,而又不失风趣,引得与会者发出阵阵友善的笑声。

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伊原泽周谈了抗战期间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将国统区鹿地亘领导的日本人反战活动同解放区冈野进(野坂参三)领导的反战活动作出比较。中国学者历来高度评价日本反战运动,并感谢伊原先生这方面研究的新贡献。但同时也认为应加强对另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即日本的大多数国民当年是怎样被误导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某些侵略策源地的那种几乎举国一致的法西斯狂热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复旦大学余子道教授在给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对日持久战略不是某一党派独一无二的创造,而是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共识。其中,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取向。中共是三阶段的持久战,注重向敌后进军,实行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国民党主张两阶段的持久战,注重“向国内退军”,以空间换时间,把阵地防御置于首位,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逐次消耗敌军,以求最后胜利。

二 战时外交

这是同战时政治密切相关的一个课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助理教授陈兼撰文考察了中共革命外交的缘起。他认为,中共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已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在皖南事变中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和德国闪击苏联这两件事,促使中共更加注重外交事务。1944年末和1945年初,中共加强了外交攻势,特别注意增进对美关系。但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美国在华意图与能力判断有误,低估了大国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在赫尔利使命失败后发生了危机。中共对美外交,是服从于推翻国民党、

夺取中国政权这一革命目标的，因此中共与美国间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

北京大学副教授牛大勇认为，在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后，中共对美外交仍保持了一定灵活性，即注意“两个区别”。因此，毛泽东得以在日本投降、国共争作战略展开之际，抢在美军助蒋运兵北进之前，巧借美军飞机，将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各大战略区主将二十余人，从延安空运回前线，争得战略先机，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莫大之影响。

陈先生的报告所引起的一个争议是，应如何评估中共在抗战期间的一些策略手段。有学者认为，在中共发展壮大原因中，战略、政略的正确起最主要作用，谋略或计谋较为次要。而就外交论，利用矛盾乃题中应有之义，“以夷制夷”也无可厚非。鉴于许多海外华人对毛泽东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谈论日本侵华战争客观作用的一些话很不理解，这次又提出批评。大陆有的学者作了解释，认为应注意毛泽东的思维特点和语言特点。毛泽东坚信历史辩证法，在充分肯定日本军国主义是侵略者、加害者的前提下，在坏事可以变好事的意义上评论其反面教员的作用，对此不应有误会。也有学者对牛大勇的报告提出质疑：对一次空运的作用是否估价过高？对偶然事件的历史影响似不应评估得过于深远。另外还有人提出，战时中共外交是从南方局开始的。

美国奥本大学助理教授翟强根据台湾方面的新资料，讨论了蒋介石 1942 年对印度独立运动的一次游说。蒋当时劝说印度国大党领袖们暂时同英国妥协，站在盟军一边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在战后就可获得有利的国际地位，从长远看，有助于印度实现独立自由。此事在英美各方引起复杂的反应。蒋低估了国大党同英国在印度独立问题上的矛盾，高估了罗斯福对伦敦的影响力。印度领导人拒绝了蒋的斡旋。尽管如此，蒋在战时对非殖民化事业的贡献仍应肯定，蒋当时之国际地位也因此事而有所提高。

美国德夫瑞工程技术学院饶英杰教授另辟蹊径，研究了抗战

期间的中美邮路(包括水、陆、空三通道)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中美邮路之维系,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使中国抗战不仅获得物质援助,而且源源不断地得到精神支援。饶先生最后希望海峡两岸公私机构和个人收藏的有关抗战史料能尽早地公开出来供大家研究,也希望有更多象他这样的非历史专业人士从不同领域参与抗战史的研究。有评论者对饶先生的研究课题感到疑惑,提问:“这有什么意义”?台湾学者张力幽默地回答:“当然有意义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嘛。烽火连八年,家书万万金啦。”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禰福辉先生利用新的史料,再度探讨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围绕中国军队指挥权发生的冲突,伊利诺斯—俄奔纳大学的博士生沈于对著名的中美合作所做了新的研究,认为这个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盟军搜集敌方情报,尤其对美军反攻冲绳起了巨大作用。

三 社会、经济与文化

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论述了战时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转变。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人们一致肯定战时中国工业的内迁,对内地发展影响很大,缩短了内地与沿海的差距。但对这时的物价管理、金融体制和经济管制,人们臧否不一。对张嘉璈在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则予以好评,认为他任用了一批人才,有效地抵制了腐败之风,清廉地推进工作。

文化大学陈重光先生对广西战时的教育普及运动及其影响,做了个案研究。他论述说:由于省政府全盘规划,学生军积极参与,教育普及到了社会下层的农民。广西是全国唯一没人参加伪组织的省。与会者对教育与经济孰更重要,展开了争论。

美国著名华裔教授周策纵报告了自己当年在重庆目睹日军空袭的惨状,提议抗战幸存者动手画下当年的活印象,写下回忆的“极短篇”,好坏不论,只要纪实,以亲见亲历为限。他举出日本人以原爆为题材所做的这类工作,慨叹中国人现在好象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族群,给世界上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受害更多更深,更值得同

情。评论者指出周老先生的提议很对,大陆目前对抗战遗址、原迹保存太少,展览馆、纪念地为数不多,应大力加强抗战文物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展出和出版工作。也有学者认为大陆的抗战纪念馆并不算少,史料征集与研究很有成就。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张力以陕西省为对象,研究了对日抗战的后勤保障与动员体制。他认为:战时影响陕西省军事动员的因素很多,人力物力征发甚钜。百姓出于抗战热情,期盼能在公平合理原则下负担民族大义。但国民政府在征兵征粮过程中,弊端层出不穷,造成军民关系恶化,一直影响到战后。评论者对张先生的论点与方法很感兴趣,纷纷提出一些建议。

马里兰大学的叶嘉焯教授论述了战时中国医护人员的培训情况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刘一皋副教授报告了他对华北农村根据地社会变革的研究。印第安那大学林小青先生考察了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学术救国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王念祖教授回顾了战后东北经济重建工作中自己的亲身经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于造成介绍了自己在抗战中的见闻。

抗战文学是会中讨论很热烈的问题。丛苏女士撰文讨论了老舍、王蓝、纪刚、萧军等十位作家的作品,认为抗战时期文坛国共两极意识形态的分化很明显,“左”“右”之争激烈,真正反映抗日战争本身的作品反而不多,无法同其他国家的“战争文学”相匹。这使文学对抗战的影响减弱了。舒乙先生到会论列了老舍对抗战文学的贡献,凸现了过去未受到重视的文艺组织。著名作家王蓝“讲文坛故事,忆抗战岁月”,介绍了第一位“殉诗”的青年诗人羊羽,刺杀周作人的三剑客,抗战中的音乐界与剧校,以及老舍、梁实秋、张道藩、杨帆、周恩来、《新华日报》的一些逸事。另一位名作家纪刚也论述了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运动。讨论中就此话题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东北在“九一八”后的14年中,完全被日本和伪满统治,这类沦陷区的文学是否应视作“汉奸文学”?

也许是文学家们比史学家们更富于激情,也许是文学艺术的

政治功用这类问题本身就很敏感,也许是个人的遭遇的创痛太深,文学组的讨论格外火爆。品人论事之际,包括该组主席在内的某些人使用了很情绪化的非学术用语,犹如骂街,令人遗憾。

四 抗战军事与日军暴行

旅居美国的原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在演讲中,对中国空军英勇抗战、以弱御强的业绩,予以高度评价。讨论中,人们特别提到美国华侨对中国空军的卓越贡献。华侨除捐机捐款、参军参战之外,还提供了主要的技术力量。如广东飞机制造厂,当时大部分技工都是华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麦礼谦专文论述了旅美华人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宝贵贡献。台湾逢甲大学李盈慧女士则探讨了战时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与海外抗日活动。

山东大学吕伟俊教授对中国海军的长江抗战加以研究,认为因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悬殊,中方迫不得已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退缩避战,而是力所能及地以要塞战、阻塞战、水雷战、游击战等灵活方式御敌,付出巨大牺牲,也建立了不朽功绩。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海军在抗战中作用不大,战斗力太差。当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几乎不相上下,到三十年代反而落后甚远,历史教训极为深刻。海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掣肘,也妨害其发展。

鉴于日本国内不断有人曲解战争性质,否认侵略罪行,许多与会学者本着史家的良知与责任,以大量史实来揭露和清算日军侵华暴行。

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祁庆阁、傅清沛等,分别论列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青岛实行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他们以详细的统计数字说明侵略者在这些地区造成的破坏,这些灾难性的恶果战后久久难以消除。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李恩涵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历数了日军在山东扫荡和“三光作战”犯下的累累罪行。向这些违反国际公法的战争犯罪和人道犯罪追索赔偿是无时限的,除“战争赔偿”外,还有“民事损害赔偿”。日本政府战后一系列翻案活动,已违反

旧金山和约第 11 条之规定，故中方随时有权改变原立场，向日方索赔。李先生的诉求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长期致力于清算日军战争罪行的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应邀作了“索赔运动的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报告。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再次考订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爱国侨胞傅运筹等将多年搜集到的日军烧杀奸淫我同胞的图片布挂于会场四壁展出，再现历史场景，惨不忍睹，人神共愤。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水野明详细探讨了七三一细菌部队与天皇、军部的关系，及其犯下的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种种反人类罪行。据他揭露，同类细菌部队在“满洲”尚有“649 部队”、“319 部队”、“25202 部队”，在中国关内尚有“北京 1855 部队”、“南京 1644 部队”、“广东 8604 部队”，在新加坡有“9420 部队”。

这些事实使得与会者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日军为何如此残暴？提出的一个解释是，日本传统神道同法西斯国家主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疯狂性。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三光作战”始于何时？有人溯于百团大战之后，有人溯于淞沪会战之中，更有人追寻到甲午战争时日军就搞“三光”，侵占台湾时也有“三光”行为。

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论文水平相当不错，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将很多问题的研究推到新的前沿，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值得注意的新问题。会议的组织工作，尤为出色。吴章铨、禩福辉、刘实等先生日夜辛劳，刘仁塘先生全家上阵，会务、公关、宣传、募捐……诸项工作由他们一一落实，终于保证会议圆满成功。唐德刚教授以其天生的诙谐风度主持了开幕和闭幕，妙语连珠，满场欣悦，也使会议增辉添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